

《華夷譯語》西洋館譯語與18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認知*

“Xi Yang Guan Yi Yu” of *Hua Yi Yi Yu* and
European Missionarie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18th Century

林純潔

LIN Chunjie

作者簡介

林純潔，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N Chunji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linchunjie@hust.edu.cn

Abstract

The “Xi Yang Guan Yi Yu” is the European languages part of the classified language dictionaries *Hua Yi Yi Yu* (Chinese-Foreign Language Glossaries) compiled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This includes dictionaries in five Chinese-European languages (Latin, French, Italian, Portuguese and German). The “Xi Yang Guan Yi Yu” were translated and compiled by European missionaries in accordance with a vocabulary formul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include political vocabulary relating to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tribute system and mythical animals with symbolic political meanings. By examin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words, we can explore the European missionari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t that tim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articular, by comparing synchronic translation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in “Xi Yang Guan Yi Yu” and diachronic translations in the works and dictionaries of previous missionaries, as well as comparing each with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Chinese word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e can se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mong missionari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erms in these dictionaries deepened Europ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witnessed to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Hua Yi Yi Yu*, Xi Yang Yi Yu, Xi Yang Guan Yi Yu, Political Culture, Missionary

《華夷譯語》是明清兩朝編撰的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與外國語言的系列對照詞典，最早是由明太祖命人編撰的漢語—蒙古語分類詞典，用以培養蒙古語人才，經略蒙古地區。1407年（永樂五年），明廷設立四夷館，將《華夷譯語》擴展為包含韃靼（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和緬甸等邊疆和周邊國家語言的多種詞典，該館的“譯字生和通事負責翻譯外番朝貢表文”^①。明代後期，會同館編撰了一個新的版本，形成了洪武版、永樂版和會同館版三個版本的《華夷譯語》，其特點是根據朝廷確定的漢語詞彙，翻譯為多種少數民族語言和外國語言，形成了通過培養語言人才以經略邊疆，並以此維持朝貢體系的傳統。

清朝建立後，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經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的統治，傳統的朝貢體系發展到頂峰。為了滿足治理邊疆和對外交往的需要，1748年（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下令將四譯館（順治年間四夷館改為四譯館）與會同館合並為會同四譯館，並編撰新的《華夷譯語》。敕諭中寫到：“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搜輯，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書例，分門別類，匯為全書。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有各成書體者，一併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

* 此為故宮博物院第二期開放課題“《華夷譯語》之西洋譯語與18世紀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成果，本課題得到龍湖—故宮文化基金、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公益資助。[This paper is the outcome of the second-phase Project of the Palace Museum, “A Study of the Xi Yang Yi Yu in the *Hua Yi Yi Yu* and Sino-European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18th Century,” which is sponsored by the Longfor-Palace Museum Cultural Fund and the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

^① 烏雲高娃：《明四夷館韃靼館及〈華夷譯語〉韃靼“來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6頁。[Wuyungaowa, *A Study on the “Da Da Guan” of “Si Yi Yi Guan” in Ming and Mongolian tribute-letters of Hua-I-I-Yü*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4), 16.]

音與字義，用於漢字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① 由此可見，乾隆皇帝試圖通過編撰多種漢語—少數民族語言/外國語言詞典，達到“文軌大同……以昭同文盛治”的目的，即“以多語文為表徵的多元族群與文化共存於同一統治框架之中，共奉大清聲教”^②，乾隆皇帝以此“論證了多族群、多語文政治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此基礎上清朝統治的正統性。”^③

乾隆年間編撰的《華夷譯語》是這套詞典的第四個版本^④，在明代17個門類（天文、地理、時令、採色、身體、人物、器用、宮殿、飲食、衣服、方隅、珍寶、文史、鳥獸、數目、通用和花木）的基礎上增加了經部、人事和香藥，共分為20個門類，涵蓋了18世紀中期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收錄的漢語詞彙由朝廷擬定，再翻譯為其它語言，包含數十種四川、雲南和廣西少數民族

^① 《清實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第13冊，第32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52-353頁。[*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Dynasty: Veritable Records of Emperor Gaozong Chun* (5), vol. 13, no. 32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352-53.]

^② 馬子木、烏雲畢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語文政治文化的構擬與實踐》，《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82頁。[MA Zimu and Borjigidai Oyunbilig, “‘Tongwen 同文’：The Structuring and Practice of Multilingual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Ethno-National Studies*, no. 4 (2017): 82]

^③ 同上，第87頁。

^④ 明朝的三個版本和清朝乾隆年間的版本後被日本學者稱為甲種本、乙種本、丙種本和丁種本，這一分類被廣泛採用。按照編撰流程，丁種本“至少有初稿本、進呈預覽本、軍機處錄副本、‘會同四譯館’校勘本等四種版本，其中進呈預覽本、軍機處錄副本應保存於皇宮大內。”參見春花、李英、郭金芳：《論清乾隆年編〈華夷譯語〉》，收錄於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編華夷譯語》第1卷，故宮出版社，2018年，第2頁。[Chun Hua, Li Ying and GUO Jinfa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Foreign/Ethnic Language Glossaries (*Hua Yi Yi Yu*) in the Qing Dynasty’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in *Hua Yi Yi 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Preserved in the Palace Museum*, vol. 1, ed.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The Palace Museum Publishing House, 2018):2.]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華夷譯語》丁種本一直藏於紫禁城，直到1931年，德國漢學家福克司（Walter Fuchs）在故宮（1925年，紫禁城改為故宮博物院）壽安宮發現（參見Walter Fuchs, Remarks on a new “HUA-I-I-YÜ,”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8 [1931]: 91-101.）。2018年，故宮博物院將之影印出版，共16卷。

語言和方言、周邊國家語言和歐洲語言。由朝廷擬定的詞彙體現了最高皇權對知識生產的控制，如雍正朝和乾隆朝重構了傳統的“華夷之辨”，《華夷譯語》收錄的“中國”“外國”“夷人”“番人”“生番”和“西番”等相關詞彙體現了清朝的對外關係認知開始從“華夷”向“中外”轉變。^①

乾隆皇帝下令在《華夷譯語》中收錄歐洲語言，試圖將歐洲語言文化納入“同文之治”，是一個很大的創新。背景是16世紀末以來中歐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葡萄牙、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傳教士被派到中國傳教，促進了中西消息的互通和文化交流。雖然由於康熙年間爆發的“禮儀之爭”，傳教士工作和中歐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影響，但很多身懷技藝的傳教士仍活躍在清朝宮廷，到了乾隆年間，中歐文化交流仍在進行。由於拉丁語是當時歐洲文化階層的通行語言，清廷在與歐洲國家交往時，遂讓歐洲傳教士擔任翻譯，用拉丁語溝通，如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和法國耶穌會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曾參與中俄關於邊界劃分談判，推動了《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但清政府懷疑傳教士偏袒歐洲國家，於是希望培養可靠的拉丁語人才。1727年（雍正五年），清廷設立西洋學館，教授內務府官員子弟學習拉丁語。1743年（乾隆八年），莊親王認為西洋學館培養的“20餘名拉丁語學生已經夠用”，遂“奏請裁撤西洋學館”，獲得批准。^②五年之

^①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編華夷譯語》第1卷，北京：故宮出版社，2018年，第66、172、187、425頁。相關研究參見林純潔：《〈華夷譯語〉西洋譯語中的“華夷之辨”》，《政治思想史》，2025年第3期，第62-76頁。[LIN Chunji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in the Xi Yang Yi Yu of Hua Yi Yi Yu,”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no. 3 (2025): 62-76.]

^② 中國國家檔案局、北京大學編：《錦瑟萬里 虹貫東西：16-20世紀初“絲綢之路”檔案文獻集萃》，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80-81頁。[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nd Peking University, eds.,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Collec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on the “Silk Road” from the 16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9): 80-81.]

後，清廷編撰拉丁語等歐洲語言詞典，似乎是對裁撤西洋學館的一個回應，希望能繼續培養西語人才。

歐洲語言共六種，分別是《拉氏諾語》（拉丁語）、《弗喇安西雅語》（法語）、《伊達禮雅語》（意大利語）、《播呼都噶禮雅語》（葡萄牙語）、《額呼馬尼雅語》（德語）和《啖咭喇國譯語》（英語），合稱“西洋譯語”。^① 拉丁語等前五種詞典都是由當時在北京的歐洲傳教士翻譯編撰，目前比較確定的是，德語詞典是由德國耶穌會士魏繼晉（Florian Joseph Bahr）編譯的；意、葡、法和拉丁語四種詞典則由各國傳教士完成，但不確定具體的編譯人員。全慧梳理了1748-1750年在北京宮廷工作的24名歐洲傳教士信息，根據他們的語種、特長和經歷，推測出：法語詞典的譯者很可能是三位法國傳教士：曾任西洋學館負責人宋君榮（Antonie Gaubil）、編撰過詞典的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和湯執中（Pierre Noël Le Chéron d'Incarville），拉丁語詞典的譯者可能也是宋君榮，葡萄牙語詞典的譯者可能是葡萄牙傳教士索智能（Policarpo de Sousa）和沈若望（João Simões），意大利語詞典的譯者可能是意大利傳教士利博明（Ferdinando Bonaventura Moggi）和席澄源（Sigismondo da San Nicola/ Sigismondo Meinardi）。^② 這五種詞典每種收錄約2070個詞彙，風格和準確度上有所差異，但分類相同，基本可以一一對應，每冊書前都題有“西洋館”三字，因此又被合稱為“西洋館譯語”。英語詞典沒有題寫“西洋館”，分類與前五種詞典大致相同（個別名稱不一致，且排列順序不同），但只收錄了734個詞彙，且錯誤較多，據研

^① 以下各語種詞典分別簡稱為拉丁語詞典、法語詞典、意大利語詞典、葡萄牙語詞典和德語詞典等。

^② 關於西洋館譯語譯者的探討，參見全慧：《〈乾隆年編華夷譯語〉之“西洋館譯語”譯者初探》，《國際漢學》，2023年第6期，第121、126頁。[QUAN Hui,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of ‘Xiyangguan Yiyu’ Yiyu in *Huayi Yi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6 (2023): 121, 126.]

究很可能是由“中國廣東十三行英語‘通事’”完成的。^① 因此，本文探討歐洲傳教士對中國的認知，主要以五種西洋館譯語為主。

當《華夷譯語》的中文詞語被歐洲傳教士翻譯成拉丁語等歐洲語言，即編撰西洋館譯語時，這些外文翻譯就會體現出當時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尤其是自秦代以來，中國在大多數歷史時期是一個由皇帝統治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迥異於歐洲多國並立的分散狀態和封建體制。傳教士來到中國後，對此印象深刻，尤其是在乾隆時期朝貢體系高度發展和追求“同文盛治”的濃厚政治背景下，他們在翻譯《華夷譯語》政治詞彙的過程中，展現了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和象徵符號等政治文化的認知。儘管在這個翻譯過程中會有一些誤解，但整體上，這個翻譯的過程和成果都是當時中歐文化交流的見證。一些翻譯中的誤解恰恰反映了當時中歐文化的一些不同，是認識當時中歐文化差異的重要材料。

關於西洋館譯語所反映出的18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政治文化認知，已有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如李雪濤梳理了其中《額嘒馬尼雅語》反映當時中國政治文化、朝貢體制和科舉體制的詞彙^②，但整體上研究還較少。因此，本文試圖以故宮博物院出版的《華夷譯語》影印版中的五種西洋館譯語為原始材料^③，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共時性地比較西洋館譯語五種詞典對涉及中國政治制度、科舉制度、朝貢體制和政治象徵動物等方面詞彙的翻譯，並

^① 黃興濤：《〈啖咕喇國譯語〉的編撰與“西洋館”問題》，《江海學刊》，2010年第1期，第152頁。[HUANG Xingta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Ying Ji Li Guo Yi Yu and the Xiyangguan problem,”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no. 1 (2010): 152.]

^② 李雪濤：《〈華夷譯語〉丁種本與〈額嘒馬尼雅語〉之研究》，《中國文化》，第53期，2021年春季號，第209-210頁。[LI Xuetao, “A Study of the Type D Version of the *Hua Yi Yi Yu* and the *Er Ma Ni Ya Yu*,” *Chinese Culture*, 53 no. 1 (2021): 209-210.]

^③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館藏乾隆年編華夷譯語》第14-18卷，北京：故宮出版社，2018年。下文列入表格進行分析的詞語均引自該書的第14-18卷。[The Palace Museum, ed., *Hua Yi Yi 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Preserved in the Palace Museum*, Volumes 14-18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18.)]

與之前傳教士對中國的論述和編撰的重要漢外詞典《漢字西譯》進行歷時性的比較，研究18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政治制度和象徵符號等政治文化的認知與中歐之間的文化交流。

一、西洋館譯語中的中國政治體制

《華夷譯語》收錄了“皇帝”“宰相”“君”“臣”“科舉”等反映中國核心政治體制的詞彙，歐洲傳教士根據他們中歐政治體制的理解，將之翻譯成了拉丁語等歐洲語言。

表1 西洋館譯語中的中國政治詞彙

漢語詞條	拉丁語譯文及其原意	法語譯文及其原意	意大利語譯文及其原意	葡萄牙語譯文及其原意	德語譯文及其原意	頁碼
皇帝	imperator	Empereur	imperatore	Imperador	Kayser (Kaiser) ^①	162
	最高統治者（源自拉丁語imperare，“命令”）				最高統治者（源自人名Caesar“凱撒”）	
宰相	minister	Ministre	consiliere di stato	Ministro	geheimer Rath (Rat)	165
	大臣、助手、僕人	大臣、部長	國家顧問	大臣、部長	樞密顧問	
君	rex	Roy (Roi)	Rè	Rey (Rei)	König	143
	國王（源自動詞regere，“指揮”及引申義“軍事統帥”）				國王（源自“出身高貴的男人”）	
臣	vasallus	Sujet	vasallo	Vasalo	Vasall	143
	附庸、封臣	臣民、國民	附庸、封臣	附庸、封臣	附庸、封臣	

^① 原文拼寫與現代拼寫方式不同，括號內為現代拼寫方式，下同。

皇帝—宰相制度是傳統中國政治的核心制度。拉、法、意、葡四種詞典對“皇帝”的翻譯均源於拉丁語imperare，就是“命令”的意思；imperator後成為羅馬帝國最高統治者的稱號，並影響到其它語言。德語詞典將“皇帝”譯為Kaiser。該詞來自古羅馬時期的終身獨裁官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的姓氏。公元前44年，凱撒被刺殺。公元前27年，他的繼承人屋大維獲得“奧古斯都”的尊稱，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凱撒”這個名字也因此成為羅馬皇帝的稱號之一，後來又成為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各國傳教士都用各自文化中對最高統治者的稱呼翻譯了“皇帝”。

拉、法、葡三種詞典對“宰相”的翻譯較為一致，都是“部長、大臣”的意思。法語Ministre和葡語Ministro均源自拉丁語minister，該詞最開始是“僕人、助手”的意思，源自拉丁語minor（意思是“較小的，次要的”）^①；後來法語ministre有了“國家官員”的意思，即從“貴族的僕人”變成“國家的公僕”^②，從而形成了現代的“大臣、部長”等含義，17世紀傳入德語。而追溯漢語中“宰相”的含義，宰最開始是“古代奴隸主家中掌管家務的總管”^③，後成為官吏的名稱；相則是“輔佐”的意思。宰相“本為泛稱掌握政權的大官，後來用以指歷代輔助皇帝統領群僚、總攬政務的最高行政長官”^④。可見，拉、法、葡三種詞典對“宰相”的翻譯較漢語原意更為寬泛，同時它們在古典含義上有類似之處，揭示了中歐歷史早期部分官員起源於貴族家僕的發展路徑，體現了東西方文化的共通性。

意大利語詞典將“宰相”翻譯為“consiliere di stato”（國家顧問

^① Dudenredaktion (Hrsg.), *Duden, Band 7, Das Herkunftswörterbuch, Etymologie der deutschen Sprache* (Mannheim: Dudenverlag, 2007), 530.

^② Ibid.

^③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等編：《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34頁。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et al., eds., *Ciy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834.]

^④ 同上，第835頁。

問)；德語詞典則譯為“Geheimer Rat”(樞密顧問)。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確立了皇帝—宰相的管理體制後，君相矛盾便成為中國帝制時期的主要矛盾之一。明太祖廢相後，後代帝王很快建立起大學士充任皇帝秘書和顧問的內閣制度；到了清朝，雍正皇帝設立軍機處，軍機大臣日常備詢，承旨辦事，君主專制達到巔峰。大學士和軍機大臣都承擔了皇帝顧問的職能，有時也被稱為“宰相”，但已不是明初廢相以前的宰相。由此可以看出，意、德詞典翻譯出了清朝時期“宰相”一詞的真實含義。

君臣關係是中國傳統倫理關係中的核心，位於三綱之首。西洋館譯語五種詞典均將“君”譯為“國王”。其中法、意和葡三種譯名都來自拉丁語Rex，而Rex源自regere^①，是“指揮”的意思，進而有“軍事統帥”的含義；德語的König原意則是“出身高貴的男人”(古德語形式kunni與拉丁語genus〈家族、種族〉也有詞源關聯)^②，與Rex有一定的關聯，因為在早期日耳曼社會中出身高貴的部落首領一般也是軍事統帥。這五個詞都是歐洲君主國統治者的頭銜，即國王。國王在歐洲的貴族體系中僅次於皇帝。君在中國傳統中，既可指最高統治者皇帝或國王，也可指各級諸侯；從詞源來看，“君”從尹從口，本意是“用口命令官員辦事的人，由此產生君主的含義”^③，與拉丁語的imperator原始含義相近。將“君”翻譯為“國王”縮小了其本身的含義。

“臣”在中國商代甲骨文中指的是“被征服者臥在地上用眼睛特

^① August Zimmermann (Hrsg.),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Hannover: Verlag der Hahnschen Buchhandlung, 1915), 223.

^② Dudenredaktion (Hrsg.), *Duden, Band 7, Das Herkunftswörterbuch, Etymologie der deutschen Sprache*, 435.

^③ 竇文宇、竇勇：《漢字字源：當代新說文解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4頁。[DOU Wenyu and DOU Yong, *Chinese Character Etymology: A Contemporary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uowen Jiezi* (Changchun: Jin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05), 44.]

別注意地看征服者的舉動”^①，就是“戰俘、奴隸”的意思；後在周朝的封建體系中具有了貴族家臣的含義，也有“國君所統屬的眾民”的意思^②；後隨着秦朝中央集權體制的建立，臣演變為皇帝的官吏。臣在《華夷譯語》中與君相對，主要是官員的意思。拉、意、葡、德四種詞典對“臣”的翻譯均為“封建領主的附庸、封臣”，都是從歐洲的封建制度的角度去理解，與中國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下的臣並不相同，但歐洲封建時代的附庸成為後來國家官吏的重要來源，體現了兩者在歷史淵源上的共通之處。法語詞典翻譯為sujet，則是“臣民、國民”的意思，也比較符合臣的古代含義，因為其詞源subjectus也是“被征服者”的意思。

17世紀末，在南京傳教的意大利方濟格會修士葉尊孝（Basilio Brollo da Gemona）編撰了拉漢詞典《漢字西譯》（1813年出版時，加入了法語）。這部詞典在18世紀被廣傳抄泛，影響巨大。它對“皇帝”、“宰相”、“君”和“臣”的拉丁語翻譯分別為imperator（皇帝）/rex（國王）、supremi consilarii（高級顧問）、rex（國王）、clavis praefectorum（重要官員）/regis ministrorum（國王的大臣）/mandarini（官員）/vassallus（附庸、封臣）^③，與西洋館譯語的翻譯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它將“宰相”譯為“高級顧問”，與意大利語和德語詞典一致；對“臣”翻譯有一致之處，但更加全面。

科舉，即分科舉士，自隋唐以來，成為朝廷選拔人才和官員的主要方式，制度日益完善，在明清兩朝達到鼎盛，它使得普通讀書人可以通過考試獲得當官的資格，由此加強了社會階層的流動，並促進了

^① 賈文宇、賈勇：《漢字字源：當代新說文解字》第16頁。

^② 《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編：《古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73頁。[The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Editing Group, ed.,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8), 173.]

^③ Par M. De Guignes,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Paris: De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13), 171, 149, 80, 604.

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從政治層面來看，科舉制度擴大了王朝的統治基礎，成為王朝加強中央集權和皇權專制的重要工具，是帝制時代政治體制不可缺少的一環。

表2 西洋館譯語中的科舉詞彙

漢語詞條	拉丁語譯文及其原意	法語譯文及其原意	意大利語譯文及其原意	葡萄牙語譯文及其原意	德語譯文及其原意	頁碼
科舉	examinare licentiatos	Examiner les lettres	essaminar'i baccellieri	Examinar Licenciado	Prüfung der halb doctoren (Doktoren)	341
	考查碩士	考查文學	學士考試		半博士的考試	
秀才	baccalaureus	Bachelier	baccelliere	Bacharel	der ehrenkrantz (Ehrenkranz) in den Schulen	181
	學士				學校中的榮譽花環	

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後，逐步了解到中國的科舉制度。17世紀初，利瑪竇將中國科舉體系中的秀才（Sieucaï）、舉人（Kiugin）和進士（Cin-su）比擬為西方大學中的學士（Baccalaurearum）、碩士（Licentiatorum）和博士（Doctoraem）。^① 這種類比在17—18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的著作中非常普遍。在這種認知背景下，西洋館譯語中的德語詞典中將“科舉”譯為“半博士的考試”；意、葡詞典將之譯為“學士考試”，與類比為學位的思路一致；拉丁語詞典將“科舉”譯為“考查碩士”，也是側重獲得學位的資格；法語詞典將之譯為“考查文學”，則強調考試的內容。五種翻譯均未翻譯出科舉“分科取士，選拔官員”的含義。

西洋館譯語對“秀才”的翻譯進一步印證了歐洲人用西方大學學

^① Matteo Ricci and Nicolas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Augsburg: Christoph Mangium, 1615), 33, 34-35, 39.

位制度來理解科舉的認知，如拉、法、意、葡四種詞典均將“秀才”翻譯為“學士”，這四個詞詞源相同，源自古法語**baceler**，有“年輕人”的意思，在中世紀封建傳統中指“因為太年輕，還不能擁有旗幟的低級附庸”，即“服務其他領主”的年輕騎士或見習騎士^①，13世紀成為大學的本科學位名稱。在明清兩代，童生通過縣試、府試和院試，進入府學、州學或縣學作為生員，就會被稱為秀才。生員由官府提供食宿，學習四書五經，準備下一階段的考試，的確有類似歐洲大學制度的地方，但學習內容和目的不同：科舉的學習內容集中在儒家經典，目的是選拔官員；歐洲大學則一般分為四大學院，即培養學士和碩士的基礎性學院——文學院（教授七藝：語法、邏輯、修辭、幾何、算數、天文、音樂，後改為哲學院）和培養博士的神學院、醫學院和法學院；除了法學專業，其它學科與做官沒有直接關聯，更多是培養各行業的人才，並會向達到畢業要求的學生授予學位，這也是歐洲中世紀產生的大學不同於以前教育機構的重要差別。德語詞典將“秀才”翻譯為“學校中的榮譽花環”，體現了秀才“秀異之材”的原意。《漢字西譯》將“秀才”譯為“*baccalaurei Sinici*”（中國的學士）^②，與拉、法、意、葡四種詞典相同。秀才只是科舉體制中功名較低的一個頭銜，還有大量與科舉相關的考試和頭銜詞彙沒有收錄進詞典，也因此未被翻譯出來。

整體上，從西洋館譯語的翻譯看出，歐洲傳教士試圖用西方語境下的政治詞彙來翻譯中國政治體制，因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誤解，如試圖用歐洲封建體制下的“國王”和“封臣”來理解中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君臣，差別較大；用“部長”來理解清朝顧問性質的“宰相”，差別也較大，但西方“部長”（Minister）和中國宰相都有着相同的詞源——僕人，顯示出中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從家臣發展出

^① A. Brachet,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8), 47.

^② Par M. De Guignes,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498.

官吏的一些共同趨勢。用大學學位制度來理解“科舉”，揭示出東西方培養和選拔人才的不同路徑。

二、西洋館譯語中的朝貢體制

在傳統的朝貢體系下，朝貢使團通常會向中國皇帝獻上一些貢品，皇帝則恩賜更多的禮品，價值遠超過貢品，以顯示天朝的強盛和皇帝的恩典。因此，一些周邊國家會以朝貢的名義與中國展開貿易，甚至一些外國商人會冒充使團進行朝貢貿易。17世紀初，利瑪竇等耶穌會傳教士便了解到了這一點。^①

清朝乾隆年間，傳統的朝貢體制發展到了頂峰。18世紀，當西方國家的使團來到中國沿海時，也會被地方官員插上“貢使”的旗幟，送到北京。清朝仍在傳統的朝貢體系下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西洋館譯語與其它《華夷譯語》一樣，收錄了“歸順”“進貢”“朝貢”“謝恩”“招撫”“賞賜”等朝貢體系的詞彙。從這些詞彙“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朝廷曉諭、撫安、招撫、賞賜的過程，以及外邦的歸順者從向化、遷善、到歸順、圖報，直至到了中國朝廷鞠躬、俯伏乃至扣頭的朝貢始末”^②。本文選取“朝貢”和“叩頭”兩個詞的翻譯來分析歐洲傳教士對朝貢體制的認識。

^①【意】利瑪竇、【意】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60頁。[Mathew Ricci and Nicolas Trigault,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trans. HE Gaoji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560.]

^② 李雪濤：《〈華夷譯語〉丁種本與〈額爾馬尼雅語〉之研究》，第210頁。

表3 西洋館譯語關於朝貢體系的詞彙

漢語詞條	拉丁語譯文及其原意	法語譯文及其原意	意大利語譯文及其原意	葡萄牙語譯文及其原意	德語譯文及其原意	頁碼
朝貢	offerre tributum	Rendre homage (hommage)	offerire il tributo	offrecer tributo	Tribut ablegen	422
	交稅、進貢	臣服宣誓、表達敬意	交稅、進貢			
叩頭	capite proster. i	Battere la tete	prostrato battere la testa	Abater cabeca	bis auf den Boden neigen	423
	俯首伏地	叩擊頭部	拜倒在地，叩擊頭部	叩擊頭部	(身體)向地面傾斜	

意、葡、德三種詞典對“朝貢”的翻譯都源於拉丁語tributum，在古羅馬是賦稅的意思；該詞“在中世紀歐洲沿用下來，封建制下的封臣向上一級領主進貢即用該詞表述。”^① 法語詞典則將“朝貢”譯為“臣服宣誓、表達敬意”（Rendre homage）。Hommage在封建時代是封臣對封君的宣誓。朝貢體制同時強調獻上貢品和表示臣服，比較而言，拉丁語等詞典的翻譯較準確地翻譯出了朝貢的含義，法語詞典的翻譯則不夠完整。

叩頭是中國的一種傳統禮儀，叩頭人雙膝跪地，以頭觸地，表示忠誠和敬意。叩頭最高的禮儀是對皇帝的三跪九叩，這種禮儀確立於清朝建立初期，即“先雙膝下跪，接着俯首以兩手撐地，並將前額叩地後直起身子，再俯首叩地共三次後起立，接着重複此一系列動作共三遍。”^②

^① 劉文明：《“朝貢體系”概念生成及跨文化反思》，《歷史研究》，2025年第4期，第30頁。[LIU Wenming, “The Mak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Tribute/Tributary System’ and Its Cross-Cultural Reflection,” *Historical Research*, no. 4 (2025): 30.]

^② 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觀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2007年，第38頁。[HUANG Yinong, “Impression and Reality: The Rites Controversy between Qing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78, no. 1 (2007): 38.]

前來朝貢的使臣同樣需要行叩頭禮。這個詞彙收錄在朝貢相關的詞彙中間，顯然是針對藩屬和外國人而言。在西洋館譯語中，拉丁語詞典將“叩頭”譯為“俯首伏地”，法、葡詞典譯為“叩擊頭部”，德語詞典譯為“（身體）向地面傾斜”，意大利語詞典譯為“拜倒在地，叩擊頭部”，最接近叩頭漢語本意的是意大利語詞典。可見，歐洲傳教士對“叩頭”描述的準確程度不一。身處清宮的歐洲傳教士必定向皇帝行過此禮，並觀摩過其他臣民行此禮，但法、葡、德三種詞典未翻譯出叩頭的完整意思。

17世紀末的《漢字西譯》將“朝貢”翻譯為“*referre clientelare obsequium*”（以順從來回報依附關係）^①，未翻譯出“獻上貢品”的意思；將“叩頭”譯為“*genibus flexis caput ad terram demittere*”（彎曲膝蓋，將頭低至地面）^②。比較而言，西洋館譯語對“朝貢”和“叩頭”的翻譯較《漢字西譯》更為全面和準確，這或許與編撰西洋館譯語的傳教士位於北京朝廷，而《漢字西譯》編者——傳教士葉尊孝長期在南京、陝西等地傳教有關。

“朝貢”和“叩頭”的翻譯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們是清朝切實施行的對外交往制度和內外一致的禮儀。清朝自與西方國家接觸以來，就將西方使節納入了朝貢體制，遵守中國的跪拜禮儀是交往的重要前提。叩頭是朝貢的核心禮儀，這些“禮儀活動本身正是權力關係的產物與談判過程。”^③

17世紀末和18世紀早期，葡萄牙、俄國等國使團都曾在遵守這個禮儀的前提下進行外交活動。^④ 這體現了朝貢體系的強大影響。但朝

^① Par M. De Guignes,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287.

^② Ibid., 78.

^③ 【美】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7頁。[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trans. DENG Changchu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9): 17.]

^④ 秦國經、高煥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英國首次遣使訪華實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72頁。[QIN Guojing and GAO Huanting, *The Emperor Qianlong and Macartney: The Record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72.]

貢體系與歐洲興起的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並不相容，到了18世紀末，當已經完成工業革命，國力強盛的英國派遣官方使團來到中國，試圖用歐洲的國際關係模式來與中國交往時，衝突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而朝貢的話語體系和叩頭禮儀，成為兩種國際體系模式衝突的最直接體現。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馬戛爾尼在呈遞給中方的文書中自稱“欽差”，引發乾隆皇帝的不滿。他立刻發上諭要求更正：“該國遣使入貢，安得謂之欽差……無論該國正副使臣，總稱為貢使，以符體制。”^① 只有中國皇帝派出的使臣才是欽差，對方稱欽差，意味着與中國追求平等。英方將攜帶的國禮稱為“禮物（Presents）”，中方則稱之為“貢品”。英方準備的禮物清單中文譯本在軍機處入檔時，其中“大部分的‘禮物’都被刪除，只保留了兩處，而其餘兩處改為‘貢物’或‘貢件’。”^② 據副使斯當東的記載，他們知道中國人對禮品的中文稱呼，斯當東將之譯為“TRIBUTE”^③，可見他對貢品（Tribute）的表述與西洋館譯語中的拉、意、葡、德四種詞典的翻譯一致，顯示了他們的共同認知。中方將“禮物”改為“貢品”引發了英方的不滿，雙方曾發生爭執。

而中英最大的外交糾紛在於英國使團不願對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禮。英國使團提出由中方大臣向英國國王畫像行同樣的跪拜禮，遭到中方的拒絕，顯然只有作為朝貢對象的中國皇帝能享受這個禮儀，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20頁。[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120.]

^② 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使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274頁。[WANG Hongzhi, *The Dragon and the Lion: Translation and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23), 274.]

^③ George Stau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2 (London: G. Nicol, 1797), 303.

而不是中國大臣對等地向對方君主行同樣的禮儀，因為清朝君臣還沒有意識到對等是現代國際關係禮儀的基本要求。中英雙方艱難完成了這次外交活動。按照中國官方的記載，1793年9月14日（八月初十）和9月17日（八月十三）乾隆皇帝兩次接見英國使團，英國特使第一次行單膝跪地禮，第二次行三跪九叩禮。^①而按照英國人的記錄，英國特使第一次行單膝跪地禮，第二次行“深鞠躬禮（profound obeisance）。”^②可見，中英就同一禮儀事件有着截然相反的記錄。

叩頭禮儀成為18世紀後期中英交往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一直影響到19世紀。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阿美士德使團訪華，中英又因叩頭禮儀爭論陷入僵局，並追溯到馬戛爾尼使團是否行三跪九叩禮的問題，多次爭論，最終使團無功而返。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叩頭禮儀連同使節如何覲見咸豐皇帝成為一個嚴重的外交問題，影響到了當時的外交談判和戰爭進程。一直到同治皇帝開始親政的1873年，清廷經過多方討論和交涉後，才最終同意外國使節覲見時對皇帝行鞠躬禮和作揖禮，這場長達80年的外交禮儀之爭才得以結束。

馬戛爾尼使團究竟是否向乾隆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禮，至今仍有爭論。^③但由此可見，政治禮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力表達，西洋館譯

^① 秦國經、高煥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英國遣使首次訪華實錄》，第85頁。

^② 【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67、377頁。[George Stau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trans. YE Duiy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3), 367, 377.] 第二次鞠躬禮原文參見George Stau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3 (London: G. Nicol, 1798), 64.

^③ 黃一農在研究了眾多中外檔案原始資料後認為：“英使於八月初十日在御輦之外迎接鑾輿時，是仿三跪九叩禮的過程，單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在御輦中覲見皇帝時，則是先在寶座所在的平台前，行雙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向地之禮；當其拾級登上寶座所在之平台時，則以單膝下跪禮呈遞國書。”參見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第57-58頁。其它重要研究參見【英】沈艾娣：《翻譯的危險》，趙妍杰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第128-130頁。[Henrietta Harrison, *Perilous Translations*, trans. ZHAO Yanjie (Beijing: Democracy and Construction Press, 2024):128-130.]

語在這些禮儀上的翻譯在帝國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但也必須注意到，西洋館譯語未能在中英交往中發揮出預想的作用，因為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期間交涉的內容遠超西洋館譯語的詞彙表達。清廷曾致力於培養拉丁語人才，但由於政策不連貫，西洋學館遭到裁撤，由此“清朝政府始終未能培養出能夠代表自身利益的、兼通歐洲語言文字和漢語的滿、漢人‘譯官’”^①，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期間，中方仍然只能依靠歐洲傳教士進行翻譯。中英在朝貢話語和禮儀上的劇烈衝突也打破了乾隆皇帝通過西洋譯語將歐洲語言文化納入“同文之治”的意圖。

三、西洋館譯語中的中國政治象徵動物

龍和鳳凰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獸，在政治象徵體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洋館譯語均收錄了這兩個詞彙。

表4 西洋館譯語收錄的動物詞彙

漢語詞條	拉丁語譯文及其原意	法語譯文及其原意	意大利語譯文及其原意	葡萄牙語譯文及其原意	德語譯文及其原意	頁碼
龍	draco	Dragon	dragone	Dragao	Drach (Drache)	357
	古希臘神話和基督教中的一種怪獸					
鳳凰	aquila	Phenix	aquila	Aquia	Adler	365
	鷹	菲尼克斯，古希臘神話中的不死鳥			鷹	

龍在中國神話中由蛇身、鷹爪、魚鱗、鹿角多種動物特徵組合而成，原為天子和高級官員均可使用的紋樣，後隨着皇權的加強，皇帝

^① 烏雲高娃：《清四譯館“西洋館”》，《文化雜誌》第53期，2004年冬季刊，第139頁。[Wuyungaowa, “The Xiyang Guan of of the Qing Dynasty’s Si Yi Guan,” *Cultural Magazine*, No. 53 (Winter 2004): 139]

逐步壟斷了龍紋的使用，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五爪龍作為標誌。西洋館譯語五種詞典都將龍譯為與dragon相關的詞彙。Dragon是古希臘神話和基督教中的怪獸，長有兩只翅膀，會噴火，一般是邪惡或魔鬼的象徵^①。Dragon與中國龍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由蛇或猛獸等多種動物的特徵混合而成的想像動物，但中國龍作為皇權的神聖象徵和民間信仰中掌管降雨的神靈，迥異於邪惡的dragon。這個譯名源自17世紀初利瑪竇等傳教士對龍的翻譯。傳教士很早就意識到龍在中國的地位，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寫道：“龍在中國是皇權的象徵，除了皇室之外，誰都不準用龍來作為徽記。”^②，意大利語原稿中對龍的翻譯是dragoni和dragone^③。金尼閣將利瑪竇手稿譯為拉丁語，並進行增訂後在1615年出版，書中採用的翻譯是Draconem^④。1616年，金尼閣的侄子小金尼閣將該書譯為法語時，統一採用了dragon的譯名，“這大概是中國‘龍’與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完整對譯”^⑤，對西方語言翻譯“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7世紀末的《漢字西譯》採用了dragon的譯法。^⑥這種譯名沿用至今，影響深遠。

鳳凰是中國傳統神話中的神鳥，也是由多種動物特徵融合而成，是皇家尊嚴和太平盛世的重要象徵。拉、意、葡、德四種詞典將之翻

^① 在《聖經·啟示錄》12：9中寫到：“大龍（dragon）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參見《聖經》（中英對照和合本），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7年。[*Holy Bibl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nese Union Version) (Shanghai: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and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2007).]

^② 【意】利瑪竇、【意】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383頁。]

^③ Matteo Ricci, *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vol. 1, Pasquale M. ed.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80, 347.

^④ Matteo Ricci, Nicolas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Augsburg: Christoph Mangium, 1615), 390.

^⑤ 施愛東：《16-20世紀的龍政治與中國形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4頁。[SHI Aidong, *The Politics of the Dragon and the Image of China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i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4.]

^⑥ Par M. De Guignes,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929.

譯為“鷹”；鷹在古希臘神話中是宙斯的使者，後成為古羅馬帝國皇帝的標誌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紋章，是神聖權力和皇帝的象徵，還具有象徵上帝、耶穌和福音書作者約翰等神聖含義。^① 法語詞典將鳳凰譯為Phenix（菲尼克斯）。菲尼克斯源於古希臘神話中的不死鳥，“形似老鷹，羽毛發出紫金光芒”^②。這體現了歐洲傳教士對中歐兩種具有神聖象徵作用的鳥的認識。自17世紀，傳教士就開始了解到中國的鳳凰。如1656年，傳教士卜彌格（Michal Boym）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書籍《中國植物誌》（*Flora Sinensis*）中介紹了鳳凰，書中畫了兩只鳳凰的形象，並標注為Mas. 鳳（Fùm）、Fem. 凰（Hôam）^③。這裏採用音譯，並對鳳和凰做了區分：Mas.代表雄性，Fem.代表雌性，與中國傳統中對鳳和凰的區分一致。17世紀末的《漢字西譯》收錄了鳳和凰，並標注雌雄，對“鳳凰”的翻譯則是“avis quaedam fabulosa apud Sinenses/avium rex/aquila”（中國傳說中的鳥、鳥中之王、鷹）^④，同時對之進行了解釋和比擬。後來，隨着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了解的加深，西洋館譯語中法語詞典用Phenix直接進行對譯的方法成為現代翻譯鳳凰的主流，放棄了用現實中存在的鷹來翻譯傳說中動物的做法。

從西洋館譯語對龍和鳳凰的翻譯來看，歐洲傳教士都是用西方神話或現實中類似的動物來對譯，帶來了很多誤解。Dragon和Phenix這兩種譯名成為翻譯“龍”和“鳳凰”的主流，在後世引起了很多爭議和詬病，尤其是龍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徵和中國的重要形象元素之

^① 林純潔：《德意志之鷹：紋章中的德國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7、47和48頁。[LIN Chunjie, *The German Eagle: A History of Germany in Coats of Arms*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37, 47, 48.]

^② 羅活：《菲尼克斯/鳳凰——新神話的誕生》，《中國比較文學》，2023年第1期，第234頁。[LUO Tian, “Phoenix/ Feng-Huang—The Birth of a New My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1 (2023): 234.]

^③ Michal Boym, *Flora Sinensis*, Wien: Typis Mattaei Rictij, 1656, x.

^④ Par M. De Guignes,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899.

後，西方dragon所帶有的邪惡形象成為反對這種譯名最重要的理由。

結語

清廷繼承了明廷通過編撰語言詞典，培養語言人才的傳統，以此在邊疆治理和朝貢往來中佔據主動地位。通過以漢語詞典為中心，確定各語種漢—外詞典的體系，與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央邊疆體系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相適應，語言成為治理邊疆和維持朝貢體系的關鍵性工具和重要象徵。18世紀中期，乾隆皇帝下令編撰的多語種《華夷譯語》，“表面看是為清朝治下諸多語言與文字建立了秩序，事實上則是確立皇帝居於核心的多元文化秩序”^①。乾隆皇帝要求在傳統《華夷譯語》基礎上增加拉丁語、法語、德語等西洋譯語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創舉，是這個時期中歐文化交流的一個重大文化工程，表明他將歐洲語言文化納入“同文盛治”的意圖。直到1793年，這一意圖在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交涉中落空。

儘管西洋館譯語編撰完成後，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等中歐交往中未發揮預想的作用，但從它翻譯的政治性詞彙，可以看出在京供職的歐洲傳教士對當時中國政治體制、朝貢體制和政治象徵動物的認識。通過與17世紀初利瑪竇的《中國札記》和17世紀末葉尊孝的《漢字西譯》的比較，可以看出，三種文本在許多核心概念的翻譯上是大致一致的，體現了17—18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普遍看法。

“翻譯活動實際上自始至終都是一種被權力話語所操縱與控制的活動”^②，1748年乾隆皇帝的敕諭體現了權力對話語及其翻譯的決定

^① 馬子木、烏雲畢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語文政治文化的構擬與實踐》，第92頁。

^② 呂俊：《翻譯研究：從文本理論到權力話語》，《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108頁。[LYU Ju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ory of Text to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 1 (2002): 108.]

性影響，但翻譯並非絕對的“服從”；由於翻譯個體的身份、立場和認知水平，必定不可能完全譯出權力所確定原文的原意。由於五種西洋館譯語分別由歐洲不同國家的傳教士翻譯編撰而成，因此對這些概念的翻譯不一致。歐洲傳教士試圖從歐洲封建體制的角度出發，理解中國的“皇帝”“宰相”“君”“臣”等概念，儘管這些翻譯不太符合這些詞在18世紀的主要含義，但不少翻譯與對應的中國概念的古典含義有類似的淵源，展現了中西方文化的共通之處；從歐洲神話和現實的動物中理解中國的龍和鳳凰，表明了歐洲傳教士的西方文化本位，這是不同文化交際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從歐洲傳教士對“朝貢”和“叩頭”的翻譯來看，他們對中國的朝貢體制有一定的了解，對叩頭禮儀有直接的認識，但翻譯的多不夠完整或準確。儘管西洋譯語沒有在歐洲正式出版，且存在着一些誤解或缺失，影響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從整體上看，西洋館譯語的編撰和對中國政治文化相關詞彙的翻譯加深了歐洲傳教士對中國的認識，見證了18世紀中歐的文化交流史，體現了當時中國國際性的一面，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rachet, A.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8.
- Boym, Michal. *Flora Sinensis*. Wien: Typis Mattaei Rictij, 1656.
- Dudenredaktion (Hrsg.). *Duden, Band 7, Das Herkunftswörterbuch, Etymologie der deutschen Sprache*. Mannheim: Dudenverlag, 2007.
- Fuchs, Walter. "Remarks on a new 'HUA-I-I-YÜ'."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8 (1931): 91-101.
- Guignes, Par M. De.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Paris: De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13.
- Ricci, Matteo. *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vol. 1. Edited by Pasquale M.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 Ricci, Matteo, and Nicolas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Augsburg: Christoph Mangium, 1615.
- Staunton, George.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2. London: G. Nicol, 1797.
- Zimmermann, August (Hrsg.).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Hannover: Verlag der Hahnschen Buchhandlung, 1915.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編：《古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The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Editing Group (editor).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8.]
- 春花、李英、郭金芳：《論清乾隆年編〈華夷譯語〉》，收錄於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編華夷譯語》第1卷，故宮出版社，2018年，第1-36頁。[Chun hua, LI Ying and GUO Jinfang. "A Study of Huayi Yi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In *Hua Yi Yi 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Preserved in the Palace Museum*. Vol. 1.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18:1-36.]
- 賈文宇、賈勇：《漢字字源：當代新說文解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DOU Wenyu and DOU Yong. *Chinese Character Etymology: A Contemporary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uowen Jiezi*. Changchun: Jin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等編：《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editor). *Ciyuan* (Origins of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itor).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英】沈艾娣：《翻譯的危險》，趙妍杰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Harrison, Henrietta. *Perilous Translations*. Translated by ZHAO Yanjie. Beijing: Democracy and Construction Press, 2024.]
- 【美】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Hevia, James L.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Translated by DENG Changchu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9.]
- 《聖經》（中英對照和合本），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7年。[*Holy Bibl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nese Union Version), Shanghai: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and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2007.]
- 黃興濤：《〈啞咕喇國譯語〉的編撰與“西洋館”問題》，《江海學刊》，2010年第1期，第150-159頁。[HUANG Xingta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Ying Ji Li Guo Yi Yu and the Xiyangguan problem.”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no.1 (2010): 150-159.]
- 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觀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2007年，第35-106頁。[HUANG Yinong. “Impression and Reality: The Rites Controversy between Qing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78, no. 1 (2007): 35-106.]
- 李雪濤：《〈華夷譯語〉丁種本與〈額呼馬尼雅語〉之研究》，《中國文化》，第53期，2021年春季號，第197-218頁。[LI Xuetao. “The New *Hua yi yi yu* (1748) and the Research on Sino-German Vocabulary.” *Chinese Culture* 53, no. 1 (2021): 197-218.]
- 林純潔：《德意志之鷹：紋章中的德國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LIN Chunjie. *The German Eagle: A History of Germany in Coats of Arms*.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林純潔：《〈華夷譯語〉西洋譯語中的“華夷之辨”》，《政治思想史》，2025

- 年第3期，第62-76頁。[LIN Chunji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in the Xi Yang Yi Yu of *Hua Yi Yi Yu*.”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no. 3 (2025): 62-76]
- 劉文明：《“朝貢體系”概念生成及跨文化反思》，《歷史研究》，2025年第4期，第28-48頁。[LIU Wenming. “The Mak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Tribute/Tributary System’ and Its Cross-Cultural Reflection.” *Historical Research*, no. 4 (2025): 28-48.]
- 呂俊：《翻譯研究：從文本理論到權力話語》，《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106-109頁。[LYU Ju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ory of Text to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 1 (2002): 106-109.]
- 羅滄：《菲尼克斯/鳳凰——新神話的誕生》，《中國比較文學》，2023年第1期，第232-244頁。[LUO Tian. “Phoenix/Feng-Huang—The Birth of a New My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1 (2023): 232-244.]
- 馬子木、烏雲畢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語文政治文化的構擬與實踐》，《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82-94頁。[MA Zimu and Borjigidai Oyunbilig. “‘Tongwen 同文’: The Structuring and Practise of Multilingual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Ethno-National Studies*, no. 4 (2017): 82-94.]
- 中國國家檔案局、北京大學編：《錦瑟萬里 虹貫東西：16-20世紀初“絲綢之路”檔案文獻集萃》，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nd Peking University (editor).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Collec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on the “Silk Road” from the 16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9.]
-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館藏乾隆年編華夷譯語》第14-18卷，北京：故宮出版社，2018年。[The Palace Museum (editor). *Hua Yi Yi 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Preserved in the Palace Museum*. Volumes 14-18. Beijing: The Palace Museum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ing House, 2018.]
- 秦國經、高煥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英國遣使首次訪華實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QIN Guojing and GAO Huanting. *The Emperor Qianlong and Macartney: The Record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 全慧：《〈乾隆年編華夷譯語〉之“西洋館譯語”譯者初探》，《國際漢學》，2023年第6期，第115-127頁。[QUAN Hui.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of ‘Xiyangguan Yiyu’ in *Huayi Yi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6 (2023):115-127.]

【意】利瑪竇、【意】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Ricci, Mathew and Nicolas Trigault.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Translated by HE Gaoji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施愛東：《16-20世紀的龍政治與中國形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SHI Aidong. *The Politics of the Dragon and the Image of China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i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Stauton, George.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Translated by YE Duy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3.]

《清實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第13冊，第32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Dynasty: Veritable Records of Emperor Gaozong Chun (5)*, Vol. 13, No. 32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使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WANG Hongzhi. *The Dragon and the Lion: Translation and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23.]

烏雲高娃：《明四夷館韃靼館及〈華夷譯語〉韃靼“來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Wuyungaowa. *A Study on the “Da Da Guan” of “Si Yi Guan” in Ming and Mongolian tribute-letters of Hua-I-I-Yü*.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4.]

烏雲高娃：《清四譯館“西洋館”》，《文化雜誌》第53期，2004年冬季刊，第131-140頁。[Wuyungaowa. “The Xiyang Guan of the Qing Dynasty’s Si Yi Guan.” *Cultural Magazine*, no. 53 (Winter 2004): 131-140.]